

鸞翔楚天

方城
刘淳 李福珍 安向荣
熊廷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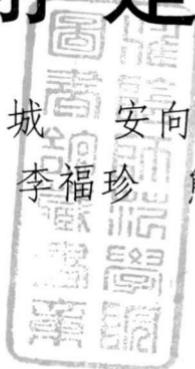
王性初 主编

1133278

鸾翔楚天

方 城 安向荣

刘 淳 李福珍 熊廷华



准阴师院图书馆1133278



中央文献出版社

鸾翔楚天

著 者/方 城 安向荣等

责任编辑/吴少京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民文排版中心

印 刷/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

850×1168mm 32 开 8 印张 19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073-0518-X/K · 206 定价:12.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



1938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武汉珞珈山。



周恩来（右二）与黄其翔（右一）、郭沫若（右三）等合影。



1958年3月，周总理在“江峡轮”上眺望“荆江分洪工程”。



1958年3月，周总理在宜昌县农村视察时，同农民交谈。



1958年4月，周总理陪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在湖北省武昌县五里界区山河乡锦绣农业合作社参观时，同农民交谈。



1958年11月，周总理在陪同朝鲜贵宾参观武钢一号高炉时，同武钢工人、劳动模范李凤恩交谈。



1958年11月26日，周总理在陪同朝鲜贵宾参观湖北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应城县红旗人民公社时，同当地干部一起进餐。



1959年，周总理到武钢视察时，与女电焊工们在一起。

周恩来幼名大鸾，字翔宇。古籍云：鸾鸟，“凤皇属也”，“见则天下安宁”。楚人尊凤。《楚辞·远游》：“雌蜺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

——题记

荆楚大地的怀念

——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

(代序)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1976 年那个风雪交加的 1 月——漫天的

风雪无情地卷走了一个伟大的名字，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时
沉浸 在一片泪的海洋之中。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经离开我们 22 年了，人民却一时一刻也
没有忘记这位旷世伟人。他的名字，已成为一个永不褪色的伟大历
史符号，一个历久弥新的崇高人格话题。

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到波澜壮阔的建设时期，周恩来踏遍
了荆楚大地的山山水水，把幸福和温暖留在每一个荆楚儿女心里。
而今，当他的百岁诞辰即将到来的时候，湖北人民怎能不倍加怀念
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呢？

周恩来第一次踏上荆楚大地的时候，还不到而立之年。

那是 1927 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以后，周恩来从白色恐怖笼

罩的上海来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即担任政治局常务委员，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此后长达半个世纪，他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此时正值大革命失败的前夜、历史大转折的关头，统一战线内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共产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均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周恩来被推到了斗争的风口浪尖。

因为亲身感受过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头脑异常清醒。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陈独秀妥协退让的右倾投降主义针锋相对，提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政变予以坚决反击的主张。

马日事变以后，他在常委会上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汪精卫“七一五”公开“分共”以后，他又提出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建议。

面对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任命他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于是，他秘密从武汉启程赶赴南昌，领导了那次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著名起义。

10年以后，当周恩来再次踏上荆楚大地的时候，历史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此时的中国，寇深祸亟，正处在存亡续绝的危急关头。此时的武汉，枢要丛集，已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

此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12月他与他的几位战友飞抵江城，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走向全国的转折，而且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推进的起点。

周恩来一身而二任。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他肩负着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联系，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他担当着领

导南方 13 省党的工作，组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职责。

长江边，蛇山下，到处闪现着周恩来忙碌的身影。

在这里，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与国民党上层及军界人物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广泛接触，对其他各党派人士和在汉的外国友人保持着密切交往，巩固和发展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里，他应邀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组建起囊括大批知名人士的政治部第三厅，使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从而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在这里，他狠抓各地中共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仅几个月时间，所辖 13 省的党组织就得到很大发展。

在这里，他领导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又一支劲旅——新四军。这支在深山密林被困了三年的部队，一出山就挺进敌后，拖住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兵力。

1938 年 10 月，日军兵临城下，武汉失陷在即，周恩来从容地对即将成为敌后的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周密部署。当他安排好其他同志和所有工作最后撤离武汉的时候，日军的炮声已清晰可闻了。

周恩来这次在武汉工作的 10 个月，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不久的关键时刻。新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许多都是这时在武汉开端的。周恩来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再一次面临两种命运的决战。蒋介石明里和谈，暗里却调遣 30 万重兵，将我在湖北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一带集结待命的中原解放军重重包围，内战一触即发。

为了妥善解决中原问题，周恩来作为军事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于 1946 年 5 月与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代表一起，来到宣化店视察。

在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愤怒历数国民党破坏停战的大量事实以后，周恩来严正指出：“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平结束，成为全面战争的起点。”

周恩来告诫李先念一定要设法用枪杆子突围出去。他和李先念等人一起研究了突围方案。

由于周恩来的据理力争，这次宣化店之行产生了一个旨在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这个协议虽然最终未能使中原内战停止，却为中原解放军进行突围准备赢得了时间。

6月26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央指示和周恩来在宣化店一起研究制定的作战部署，分三路突出重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又对湖北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苦口婆心的指导！

50年代，国家为发挥武汉中心城市的重要作用，同时改变我国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布局不合理和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决定把武汉建成华中最大的重工业基地，计划“一五”期间在武汉兴建武汉钢铁公司等一批重点项目。这无疑为湖北经济建设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就在这大好机遇即将到来的时候，周恩来关照湖北的同志要珍惜这个“好时机”，建设好武钢，“为发展钢铁事业多作贡献”，同时以建设这些重点工程为中心，带动和促进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商业的发展，把武汉建设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这一机遇，使湖北的经济建设出现了第一次飞跃。

湖北得水独厚，也因水而忧。一条长江横贯全境，得利无穷，也

受害无穷。湖北的水利建设，不仅是本省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全国影响巨大。对这项兴利除弊、关系全局的重大事业，周恩来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

1952年3月，正是全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战争正急、财政极度紧张的时候，经过周恩来的大量工作，投资巨大的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开工。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全国人民大力支援，数十万军民日夜奋战，荆江分洪主体工程提前25天完成，当年安全渡汛。两年以后，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三次泄洪，在抗御特大洪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8年春，一直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周恩来，亲率100多名专家考察长江三峡，对拟议中的三峡工程大坝坝址进行了实地勘查，对涉及三峡工程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不久召开的中央成都会议，根据周恩来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水利枢纽的报告，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在对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指导下，一贯求真务实的周恩来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为今天三峡工程的正式兴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一年，周恩来还亲自批准兴建长江流域规划的第一期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当施工过程中出现严重质量事故的时候，周恩来又亲自主持会议进行处理。这项历时9年始告竣工的大型水利工程，不仅从根本上治理了汉水，达到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而且为三峡工程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70年12月，周恩来又支持葛洲坝水利工程的兴建，决心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

1971年元旦，葛洲坝工程开工。这是一个政治热情可以代替科学态度的年代，十万大军“边施工、边设计、边勘测”，很快就问题

成堆，漏洞百出，工程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这时，周恩来已被确诊身患绝症，可他仍抱病连续三次亲自主持召开汇报会，解决葛洲坝工程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会上，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工程负责人，也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最后果断地决定停工设计，坚决改变过去外行指挥施工的做法。正是周恩来的这一正确决策，为葛洲坝工程的胜利建成奠定了基础。

尤其令湖北人民难忘的，是周恩来在 1967 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前后的力挽狂澜。

那时是个“天下大乱”的年代。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要到南方视察。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亲自打前站，先期到达武汉。

经过周恩来耐心细致的工作，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渐趋缓和。殊不知周恩来刚刚离开，时在武汉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就擅自发表煽动性的支持造反派的讲话，致使两派对立情绪骤然加剧。

7月20日，一些被激怒的群众和战士将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质问。林彪、江青一伙出于反党乱军的目的，乘机大作文章，诬之为“反革命暴乱”。周恩来闻讯即刻返回武汉，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并在此时和以后尽全力保护了陈再道等武汉军区负责人。

正确处理“七二〇”事件，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力挽狂澜诸多工作中的一件。这一阶段与“文化大革命”的其他阶段相比，其狂暴性更加突出，整个国家和社会处于空前的动乱状态之中，周恩来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作用尤其显得惊天地、泣鬼神。

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七二〇事件”平反昭雪。沉冤11年的“七二〇事件”终于以其本来面目昭示人寰，周恩来却没能看到这一天！

三

在广袤的荆楚大地上，周恩来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湖北人民无比景仰的周恩来精神。

这是一种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中，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实际上是他终生无怨无悔的人生选择。

正因为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他才在大革命失败的转折关头勇往直前，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苦工作中披肝沥胆，在“文化大革命”的空前动乱中忍辱负重。而这种选择又是源于一种信念——一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这是一种无私无我，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胸前总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他终身努力实践着共产党人的神圣宗旨。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在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他毅然离别病弱的妻子，奔赴领导武装起义的前线。在日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首先安排其他同志转移，自己最后撤离。在自己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仍然为兴利除弊的水利工程悉心操劳。

他完全超越了自我，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党的领导层中，他是率先进入共产党人这一最高精神境界的领导人。

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在周恩来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论证的时候，正是他因“反冒进”问题受到不应有批评的时候，可他仍然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他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多角度地、辩证地、全面地认识和解决问题，反对各种形式的极端化和片面性，提倡“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

同时，他又十分注重解放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斗争和工作中努力创新。正是这种精神，使他抗战初期在武汉领导的统战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交工作，不断开拓崭新局面，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

这是一种民主平等，虚怀若谷，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精神。

抗战初期，很多党外人士说，他们是通过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三峡工程论证中，周恩来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平等对待各方面人士的民主作风，也广泛传为佳话。

毛泽东曾经赞誉周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最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胸怀广阔，光明磊落，平等待人，赤诚相见。他结识的人最多，结交的朋友最多，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民主作风、最富于民主精神的领导人。

这是一种认真负责，严格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

作为一国总理，亲自解决某项工程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恐怕举世罕见。周恩来对丹江口、葛洲坝工程质量事故的亲自处理，为我们树立了勤勉敬业的楷模。

周恩来以考虑问题周密细致著称，更以对工作极端负责闻名。无论建国前后，他都日理万机，紧张忙碌，却始终保持了一丝不苟、严谨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

这是一种严于律己，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精神。

抗战初期在武汉，周恩来是佩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每月薪金 240 元。他却将这些工资全部交公，只领与八路军办事处战士一样的 5 元津贴费。每天早餐，只是一碗 5 分钱的热干面。

周恩来身居高位，却从不自视特殊。凡是要求党员和公民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而且做得更好。他把为革命出生入死，建功立业，看作是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从不把功劳、贡献作为向人民索取的“资本”。他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各项法律、制度和规定，不搞任何特殊化，即使被视为生活细节的区区小事，他也严格按照规矩办理。

一位中国学者曾说：周恩来精神“既集中了无产阶级最崇高、最优秀的品质，又集中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所凝聚的最崇高、最优秀的品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阶级性的道德精华和民族性的道德精神的高度统一”。

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的今天，湖北人民更加怀念周恩来，就是急切呼唤这种崇高的精神！

一位外国作家曾说：“再过一百年、二百年，有很多出名的人，人们都不记得他了。但是大家都会记住周恩来，全世界都会记得他。”

滔滔长江作证，湖北人民将世世代代怀念他——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